

【乡村社会发展】

迈向超地方行动：乡村产业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及其协商机制

——基于云南寻甸 Z 社区“小山茶”项目的田野考察

陈雪婧¹ 方淑敏²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杨凌 712100;2.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推进以及现代性所赋予的社区流动性特征,乡村产业发展格局不断由地方性向超地方性转变。以云南省 Z 社区“小山茶”项目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行动者—转译—网络”的分析框架,探究乡村产业发展中是如何通过建构行动者网络来开展协商实践的。首先解析乡村产业超地方行动者的关系结构,当地居民、上级政府、市场主体、外部高校等构成重要行动者。其次探索多元主体的转译协商过程,发现超地方行动者网络联结经历产业发展的问题聚焦、多元利益的协调整合、发展主体的征召联结、协商行动的动员参与四个阶段。最后探讨乡村产业中行动者网络的整合机制,由需求导向的内生驱动机制、协商取向的制度保障机制、资源共享的网络联结机制共同构成网络的运作逻辑,形成内外共生的乡村产业超地方行动者网络形态。

关键词:乡村产业;行动者网络;协商实践;超地方行动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1-0128-1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推进以及现代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封闭性的传统共同体正在向开放性的流动社区转变,各种地方性、超地方要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地方发展实践过程之中。这意味着,流动时代地方社区的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实现本土资源与外界资源的整合,同样需要妥善处理内外部的各类风险,这依靠单一地方主体或者外部主体都难以完成,要求内外部多元主体在提高自身行动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建构,以此奠定谋求共同区域产业整体性发展的韧性基础。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指出:“社会健康的关键不在于地方性的面对面互动,而取决于超地方的制度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性质。”^[1]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主体协同问题时常发生,村民、政府、企业等关键行动者因个人利益分化、行动逻辑存在差异等,难以就产业发展内容、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使得各方资源难以整合,产业发展面临行动分化难题,这还关系到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收稿日期:2024-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机制研究”(22&ZD18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22ASH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第四届“凤岗培优”研究生科研支持项目“新内生发展视角下乡村行动者网络建构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陈雪婧,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方淑敏,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因此乡村产业发展中异质行动者的协商合作问题成为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关于乡村产业主体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核心主体带动。党组织、政府被认为是主要的产业带动者,通过政府发挥县域统合作用、党建引领的“在地化调试”^[2]等方式带动当地村民、村委会等发展地方产业。此外,科技特派员、乡村能人、小农户等以其专业优势、社会威望、社会基础也可以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二是跨部门合作发展。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联结各部门主体,以获取发展资源。村与村之间可以通过支部联建、资源共享形成产业联盟,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3]。“政企合作”逐渐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主流模式,政府发挥职能、项目、资源优势,企业凭借技术、销售、市场优势,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开展产业合作并进行利益分配^[4]。三是以城带乡的产业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相关部门不断将数字技术向乡村渗透,发展乡村数字普惠金融、乡村电商等新型产业形态,并通过动员各行业主体进入乡村来实现城乡产业融合^[5]和协同发展。

现有研究对乡村产业主体协同发展的途径进行了多要素、多手段的分析,但在内外整合实践路径的探索上仍存有待提升之处:一方面是缺乏网络化取向。乡村产业发展核心是要重塑多元利益共同体^[6],不仅要国家与农民经营充分对接,还需要将乡村与广阔的市场联系起来,形成利益相关者网络,注重“地方—超地方”的网络联系。但现有研究多聚焦某一类主体或领域,未将多元主体纳入同一网络中进行整合分析,也缺乏对多层次网络关系的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是缺乏协商取向。不论是乡村产业建设还是新时期的乡村发展,都是通过不间断的权力协商^[7]增强乡村发展的控制感、效能感。现有研究对横向不同部门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协商以及纵向国家与基层之间的权力协商探讨较少。

实际上,乡村产业发展的超地方实践以超地方行动者网络^①的建构为运作逻辑。在网络化取向的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逐步达成了一种基于动态网络视角的共识,即助推农村社会形成“行动共同体”^[8]。“网络化”作为一种具有动态属性的发展机制或实践,能够最大限度地地方知识与超地方知识进行整合以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当今产业建设力图在事实层面展现“差异化的农村”,体现地方行动者与超地方行动者在权力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关系网络之间的差异关联。同时,行动者网络是具有“协商取向”的发展实践,主张通过主体间理性与反思的协商对话达成共识。其中具有协商取向的产业发展实践大致包括两条途径:一方面,组织交流活动与创设自治平台;另一方面,衡量自上而下政策与自下而上实践的衔接性。总之,乡村产业发展的网络化取向和协商取向所指向的是在广阔的行动网络中配置资源、明晰权责,以此促进不同类型行动者长期的协作^[9],以及建立一种包容的部门合作、城乡融合关系。如何进一步协调包括区域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的多层次网络关系就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 ANT)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乡村产业超地方行动的视角。行动者包含一切参与互动的要素,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人类行动者,还包括视为客体的非人类行动者,所有行动者具有同等权利,并在行动中相互制约和影响。“转译”是缔结行动者网络的关键,反映行动者与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10]。在这一过程中,所有行动者都处在“转换—被转换”的动态情境中,借由转换,各类行动者得以建立互动关

① 所谓乡村产业发展的超地方行动者网络,是指以地方社区为基本单位,在实现社区内部主体整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层级政府以及外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协商机制实现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联结,以此打造超越地方社区的行动者网络。

系,并逐步构建动态协调、平等交流的行动者网络,体现了异质主体合作的网络化模式和协商意识。在这一理论视阈下,乡村产业发展的超地方实践亦是乡村内外部多元行动者开展的转译实践。

本文以云南省Z社区“小山茶”项目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乡村产业发展中如何通过建构行动者网络来开展协商实践,具体包含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关系结构、协商过程、内在机制。“小山茶”项目由H大学项目团队发起,其不仅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而且在村民、政府、企业等多主体互动中提升了村民内生力量和社区治理成效。笔者曾四次前往云南寻甸Z社区调研“小山茶”项目,通过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文本分析等形式,深入了解“小山茶”项目的实施过程,并通过对调研资料的具体分析,探究“乡村产业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及其协商实践”这一重要命题。之所以选择“小山茶”项目作为案例材料,是因为:一方面在于Z社区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村庄的典型代表,其既面临着产业发展困境,又拥有较为丰富的地方资源,具有实践分析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小山茶”项目整合资金与专业技术力量,联动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推动实现产业增益、村民增收双赢局面,打造了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据此,本文在实践层面总结“小山茶”项目经验,有助于为西部乃至全国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更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在理论层面,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在中国乡村治理实践中,有利于拓展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解释力,促进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多元行动者的利益协调和行动耦合过程,其中核心行动者充当着转译过程中的中介者角色。行动者网络越来越多被运用到基层治理实践中,意味着该理论对于社区多元主体的行动整合起到一定指导性作用。超地方的行动者网络同时强调村民的地方行动和外部政府、市场等主体的行动介入,这是一种超越乡村地域的网络联结实践,行动者网络可以为这种复杂网络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指导。

(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观点

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转译社会学,主张平等对待人和非人、自然和社会、主体和客体的混合本体论^[11]。该理论尤其注重“整体”的网络化实践,将所有行动者置于同一动态情境中,过程性地分析异质行动者的合作,为多主体协同问题提供理论借鉴。

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套框架,来解释利益分化的多元行动者如何联结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其中涉及行动者、转译、网络三个核心概念^[12]。“行动者”是转译的基础,也是构成网络的关键。同时,在众多行动者之中,有扮演主导角色的“核心行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的层级分野,相反,所有行动者都处于同等权利之中^[13]。“转译”解释网络建立的具体过程,是指找到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然后就利益达成一致,再通过各种方式将行动者吸纳到网络中并动员其产生行动,最后形成“网络”。

转译具体分为“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动员”前后四个阶段^[14]。其中“问题化”指的是明晰行动者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并使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必经之点”。“利益相关化”是指核心行动者根据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目标赋予其相应的利益,其核心目标在于洞悉问题发生的本质原因与厘清背后的利益归属。“征召”是指核心行动者招募其他行动者构筑行动者网络,可以理解为将主体吸纳到网络中的手段,为主体参与网络建构提供前提。“动员”是指核心行动者调动网络中的各种资源,促使其他行动者参与行动、积极互动,使网络得以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行动者网络不是物理联结的结果,而是具有过程性的动态特征,

是各行动者转译与被转译的集合。在此过程中,有新行动者的加入和旧行动者的退出,转译行动也可能因“异议”而破坏网络平衡。因此,行动者网络的可持续性是维持合作的关键。

(二)“行动者—转译—网络”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乡村产业的治理作用,从资源下乡到培育乡村产业、推动政企合作等,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然而,现阶段单方面追求“自下而上”的内生性产业发展模式愈发难以满足中国乡村产业发展日益显著的开放性与多元性需求,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加强内外部资源的互动整合,推动内部动力与外部力量的有效联结。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协商实践”而言,人类行动者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能动主体,转译是多元行动者开展协商的必要过程,网络则是协商实践的结果以及决定协商持续践行的条件。由此,本文在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乡村产业发展的现实经验,从“行动者—转译—网络”三个维度分析乡村产业发展中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及协商实践。首先厘清乡村产业发展中多向度的行动者,其次通过转译将乡村产业发展的协商过程具体化,最后剖析乡村产业中行动者网络内含的整合机制(图 1)。

第一,多向度的行动者。即使行动者有人类和非人类之分,行动者网络概念也仍然强调以人为中心^[15]。本文主要对乡村产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类行动者进行梳理,非人类行动者的影响因素体现在人类行动者的互动以及转译的各个阶段中^[16]。具体来说,乡村产业发展涵盖内部和外部的四类行动者:一是作为发展动力主要来源的乡村居民;二是提供政策性支持的上级政府;三是推动产业走出村庄的市场主体;四是进行专业帮扶的相关对口单位。其中,村民扮演核心行动者的角色^①,其他主体需要围绕村民的意愿和需求开展行动,即乡村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主要以当地村民为中心产生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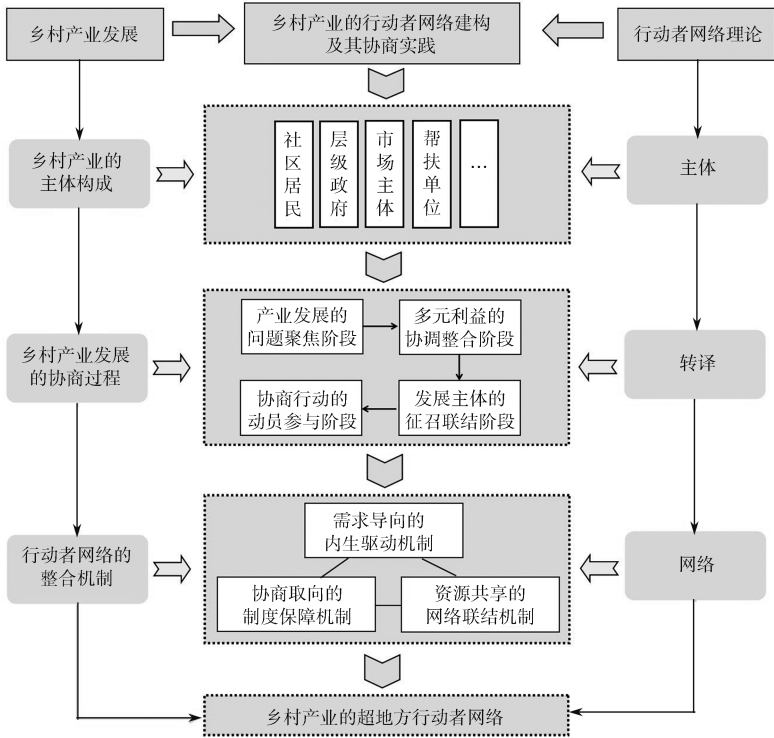


图 1 乡村产业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及协商过程

① 村民委员会属于群众自治组织,且村民的部分意见和行为通过村民委员会表达,因此文中的“村民”也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

第二,持续的转译实践。转译是行动者用自身语言表达、转换其他行动者的问题与兴趣,进而推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联结与行动整合^[17]。结合对转译的理解以及对Z社区实际田野考察,乡村产业的超地方行动者网络可看作行动者充分互动,通过产业发展的问题聚焦阶段、多元利益的协调整合阶段、发展主体的征召联结阶段和协商行动的动员参与阶段得以建构。同时解决其间随时可能出现的异议,以实现异质行动者间的协商实践。

第三,超地方的网络。异质主体经由转译实践结成网络,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来,这一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和动态互动的特征,是各种转译行为的交织。对“小山茶”项目的田野考察总结发现,在不断交织的转译行为中,整合的乡村产业网络体现以下三种运行机制:需求导向的内生驱动机制、协商取向的制度保障机制、资源共享的网络联结机制。需求、制度、资源的机制内核反映了协商实践的内生源泉、结构性保障以及持续性基础,几种机制不仅存在于时刻发生的转译实践,更是维持着网络的可持续运行,共同推动形成了乡村产业内外共生的超地方网络形态。

三、多向度的行动者:乡村产业的协商主体构成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昆明市辖县,于2018年摘除“贫困县”的帽子。寻甸县Z社区以苗族居民为主,虽拥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特色农副产品,但总体发展情况依旧较为落后,尤其是产业动力发展不足,难以有效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①。小山茶是云南寻甸县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但长期以来Z社区村民都以集市售卖的方式获取经济收入,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成本,而收入微薄。H高校在Z社区开展帮扶的过程中注意到该问题,于是积极动员村委会、政府及相关企业,共同打造“小山茶”品牌,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总体来说,乡村产业发展主要涉及社区居民、政府、市场、帮扶单位四大主体,这四大主体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成为参与转译实践和维持网络运转的主要行动者。

(一)本土参与:社区居民的协商整合

乡村作为“小山茶”项目的主要实践场域和实体空间,形成“集合”的地方村民实际上构成了最为核心的利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但作为“个体”的地方村民在项目发展的不同时期通常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项目开发前后,主要是由村干部和积极性较高的村民骨干精英在高校协助下参与项目的申报和规划工作,在其中扮演着乡村需求以及发展条件反馈者的角色。在项目申报工作完成之后,乡村会围绕该项目开展一系列具体工作,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村民自下而上地策划、动员、组织以及执行,同时也需要当地村民在实践过程中及时反映项目运行中的实践状况、困难与需求,以方便政策调整和更新。就此,Z社区通过发挥“支部引领、能人带头、群众参与”作用,依托云品寻师种植养殖合作社来运作项目。总体而言,村民是“小山茶”项目实践这场“舞台戏”的主角,需要在国家政府所搭建的舞台上推动剧情展开。

(二)上下联动:层级政府的多元支持

上级政府在项目实践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具体角色和职能分工发生了一系列转变。“小山茶”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包办”到“放权村民”再到“政府搭台”的变化。地方政府虽然也会参与乡村的产业发展,但主要是充当宏观调控者、政策制定者、平台搭建者以及中间

① 项目执行之前,Z社区产业发展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产业发展缺乏包括资金、技术、平台等形式的外部资源支持;(2)经营模式较为落后,本土资源培育和发掘有待加强;(3)产业发展格局存在结构性问题,可持续性差,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环境和结构有待改善。

协调者等角色^[18]。具体而言,中央、省、市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乡村建设的布局设计和宏观调控工作,并且根据上级部署安排和乡村建设的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Z 社区所在的地方政府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直接参与者,需要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和资源条件,组织“小山茶”项目的申报工作,并在项目的开发和运行过程中,向上实时反映项目发展的现实需求,帮助 Z 社区争取足够的资源条件和政策支持。同时,地方政府还负责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鼓励供销社与云品寻师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对接,根据 Z 社区地方特色来推广销售产品,形成了合作社发展与地方资源条件相嵌入的联合发展模式^[19]。如果把乡村的产业发展比喻成一场“舞台剧”,那么在此场景中的上级政府不再直接“登台唱戏”,而开始从“台前”转向“幕后”,将舞台空间交给村民和社会力量。

(三) 资本下乡：市场主体的行动介入

市场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激发乡村内外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20]。具体而言,市场力量通常会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入驻村庄,并在项目规划下从事产业生产、商业经营等市场活动。在“小山茶”项目中,W 文创公司、各承包企业不仅是特色产业发展和 Z 社区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同样也带来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类型丰富的发展资源。但客观而言,在产业发展的协商实践中,外部市场主体其实是本地村民发展行动的主要补充,是产业项目实践中的重要协同者。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第二产业主导的村庄中,不乏外来市场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因此,Z 社区的项目开发建设既要内外部市场主体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以形成可持续的参与动机,也要通过“小山茶”特色产业带动地方社区发展;不仅要通过带动就业提高当地村民收入,还要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发展、生态保护等。因此,市场主体在国家政府搭建的“舞台”上,与村民共同推进乡村建设,避免唱产业发展的“独角戏”。

(四) 专业协作：对口单位的持续帮扶

“小山茶”项目最初由 H 高校项目团队发起并动员。项目团队通过调研发现当地茶文化历史悠久,盛产小山茶。基于小山茶优良药性,项目团队联合当地供销社打造独特的茶叶品牌。同时在调研过程中,项目团队了解到村民也有将小山茶规模化发展的意愿,且部分村民愿意加入,于是决定发展“小山茶”项目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还帮助成立云品寻师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促进 Z 社区的产业振兴。首先,挖掘产品特色。基于小山茶的优良药性,项目团队联合当地供销社在产业包装中宣传其产品功效,打造独特的茶叶品牌。其次,注重产品宣传。项目团队联动茶叶生产部门工作人员运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对小山茶进行推广。最后,创新销售方式。为帮助小山茶产品扩大市场份额,项目团队对小山茶的部分销售工作人员展开为期 3 天的直播带货课程培训,以此帮助小山茶产业建立“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同时,由高校帮助整合资金与专业技术力量,协助社区平整农业用地、修缮种植大棚、提升种植养殖技术,切实增加村集体收入。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团队特别注重培育 Z 社区的内生力量,逐步把项目发展的主导权交给社区居民。

四、持续的转译实践：乡村产业发展的协商过程

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超地方行动者的参与,但这些内外部行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也通常有自己的利益需求^[21]。如何整合多边需求和利益,成为缔造和维持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关键,而这主要基于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工作而实现。“转译”在乡村产业发展实践中,表现为将代表村民的村委会置于治理中心点,认知上级政府和市场部门等主体参与产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并合理定位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次序。村委会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多元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建设,进而构建平等的超地方行动者网络。

(一) 产业发展的问题聚焦阶段

村委会作为核心行动者,对社区产业发展进行问题化的处理,这基于其一定的自我洞察问题的能力。社区要想联结多元行动者,对村民能力有一定要求。在项目开展之初,大部分村民年龄较大,对项目有一定疑虑,且自我效能感不强,造成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不高,积极和消极的行动态度同时存在^[22],很难激发村民参与项目建设。地方政府摒弃包办逻辑,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开发“小山茶”项目,以此调动市场力量参与,但其所关注和追求的更多是“招商引资”,即如何吸引外部市场主体参与投资和开发建设,忽略村民自身能力的培育,社区内生力量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此外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当地产业发展格局存在结构性问题,可持续性差,且地方内部与外部的连接通道阻塞,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环境有待改善,导致地方的无力感和市场的低效能感,市场未能进入地方发挥应有效用。虽然H高校为“小山茶”项目提供了第一手支持,但因其未长期驻扎村庄,不能跟踪项目的最新进展和村里的最新情况而未能成为核心行动者。村委会与H高校保持良性沟通,建立稳定联结,是项目可持续运行的保障。

因此,作为核心的行动者,代表村民的村委会需要积极平衡各方利益,努力达致各主体利益均衡,维持友好协作关系。纵向来看,村委会既要响应上级政策规定,又要帮助村民争取自身权益;横向来看,村委会既要依赖市场的资源支持,又需要与帮扶单位保持长期合作。实际上村委会所处的位置既是纵向体制延伸与横向主体交流的交汇点,也是联络政策下达与地方实践的结合点。在进一步扎根地方实践基础上,村委会洞悉“小山茶”项目实际存在的问题,协调多方思想,以此作为“转译”出发点。“促进超地方网络行动者的良性协商”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即转译的“必经之点”。只有多方基于村庄需求协商一致,才能打通这一必经之点,产生协同行动推进“小山茶”项目顺利运转,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大家都想搞,但组织不起来,各有各的看法,经常产生争执,不能太专制,也不能只听村民的,所以要做非常多的沟通协商工作。当大家能聚在一起平和地谈事情,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B03)

(二) 多元利益的协调整合阶段

对于乡村产业发展而言,村委会要想动员各行动主体产生合作,就要以满足他们利益为前提。村民在项目中追求自身收益的增加,只有项目收益与自己的劳动相匹配,或者比现有工作收入高,才会愿意参与。且这种参与基于一定的信任,如果有村干部带领,他们会更容易参与其中。上级政府更多考虑政策合理性,是否能够解决村民问题(尤其是收入问题),能否带动乡村经济,能否促进地方发展,以及能否为本地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市场主体以经济收益为工作重心,它们希望在项目参与中获得利润,而非纯粹的村庄产业扶持。企业会计算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如果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它们的业务开展会更顺利,且对于扶贫产品的支持也能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社会认可度。高校帮扶单位希望在实践中获得学术价值,在政策引导下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场地、技术等各方面支持,在获得一手调研资料的同时提炼实践经验,争取学术创新。在付出资源支持的同时,帮扶单位也希望得到地方村民和政府的认可,这是对他们学术能力的肯定和自我效能感的强化。

社会治理本质是协调不同主体利益进而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23],通过利益共同体打造价值共同体、自治共同体,进而构建多层次的乡村治理体系。明确乡村产业发展问题的过程

即厘清利益主体及其行为逻辑的过程,其中实现各主体的利益均衡将对协商过程产生直接影响。乡村产业的各主体在网状关系结构中,由于利益诉求、权力地位、行为逻辑不同,很难组织起来产生共同行动,需要从利益相关者最深层次的行动逻辑出发,通过整合多元利益诉求,调整角色和关系^[24],以振兴产业为基础,激发主体参与意识,推动形成多方共赢、开放平等的乡村协同治理网络。循此而言,村委会应在明确社区问题本质基础上,通过协商互动找寻主体共识、整合利益诉求,构建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主体行动机制。

村民对社区建设关注度不高,是发动村民参加项目最难的点,也是这个项目的痛点。因此项目最重要的就是询问村民需求,以此为起点协调其他相关单位。(D01)

(三) 发展主体的征召联结阶段

在“小山茶”项目中,村委会因地制宜,根据主体定位、资源属性以及发展规划开展行动者吸纳工作。根据上文提到的转译“必经之点”,吸纳主体参与地方协商平台的搭建有以下两个思路:一方面,依靠社区组织。由于乡村产业超地方行动者网络所具有的复杂性,其中协商平台的建构也具有层次性和多元性。高校和 Z 社区共建云品寻师种植养殖合作社,不仅仅是为了整合资金与专业技术力量,更是将合作社作为协商平台,通过发挥“支部引领、能人带头、群众参与”作用,在多元主体之间搭建起协商的桥梁。在此期间,H 高校多次开展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坊^①,和村民共商产业发展之路。同时开展小组活动、建立积分兑换制度、组织摄影大赛、建立志愿服务队和舞蹈队等,培育社区骨干、激发村民向心力和凝聚力,将更多的村民纳入种植养殖合作社,使村民从“小山茶”项目的边缘逐渐走向协商的中心地位。协商平台通常在项目组织申报与建设初期以及遭遇重大发展决策时使用较多,需要多元行动主体协商后做出决策。随着项目的推进,这种协商平台会逐渐下沉,通常是由乡村建设中形成的各类组织群体搭建,以供内部协商或者组织之间协商。另一方面,推动协商从非正式向正式转变。为了提高协商工作的规范性和协商效率,Z 社区中的协商机制也不断建立健全,从非正式协商向正式的制度化协商转变,由最初的“院坝会”逐渐形成能够代表居民发言的“村民议事会”。并且地方政府和以志愿服务队、舞蹈队、合作社为代表的村社组织在协商机制中承担着重要的监督管理职能,为协商工作的顺利推进以及各协商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规制保障。Z 社区运用以上两种征召策略,结合已有的资源优势,不断创设新的治理方案与治理思路,为接下来的“动员”打下坚实基础。

(四) 协商行动的动员参与阶段

动员阶段主体间产生真正的关系联结^[25],且在这一阶段不同主体的优势和资源得以联动,进而通过互动建立动态平衡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一决定性阶段,“小山茶”项目的协商动员行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超地方协商平台建设,拓宽协商渠道和协商机会。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趋势的不断深入,数字技术为超地方协商提供了便捷条件。乡村建设中的超地方协商需要妥善运用各类新型的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协商平台建设,通过“脱域”的协商平台将“在场”与“不在场”的行动主体联结起来。在“小山茶”项目中,村民们建立起微信群,发布、沟通、商讨项目事宜,并通过“院坝会”或“村民议事会”将信息传达给没有手机的村民,以此实现“线上+线下”的乡村产业协商形式。

第二,超地方协商机制建设,为协商工作的规范化、高效化以及多元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

① 高校在产业发展方面多次开展了“种植养殖合作社的发展致富之路”“种植养殖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在合作社中拓宽农民的致富路”等主题工作坊。

规制保障。协商决策的执行与落实直接关乎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行动机制提供保障。更为关键的是,执行协商决策的现实情境具有不确定性,很多意图之外的非预期因素会对发展实践产生影响。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协商结果能否得到贯彻落实,不仅直接关系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效果,还直接影响后续协商工作能否如期开展。若协商实践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各项目关联者的信心以及彼此的信任将会得到巩固。

第三,建立健全相应的动态调节机制,加强协商实践推进工作。协商决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本身也是多元主体之间在行动层面加以磨合的过程。“小山茶”项目注重协商机制的灵活性,建立健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意见反馈机制,为多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留有足够的韧性空间。多元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及时了解、反馈最新信息,并据此做出新的安排,进而能够实现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动态调节。这意味着,乡村产业的协商机制不再是单次的、静态的协商决策,而是持续性的动态协商过程。当然,协商实践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政府在其中发挥必要的职能。例如,需要对当地相关帮扶项目重大事项协商实践的进度加以调控,当多元主体产生重大分歧时,通常也需要国家政府力量的介入。

志愿服务队伍、合作社、舞蹈队、村民议事会是最主要的协商平台。村民很少向村委会直接提意见,而是把想法告诉舞蹈队队长之类的,因为他们更亲近更信任。合作社也是定期开会,除了开会,代表也会把大家的想法和困难告诉我们。(A01)

五、超地方的网络:乡村产业协商实践的内在机制

总体而言,“小山茶”项目以多元行动者需求尤其是社区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来推动产业建设,并实现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统一。随着社区居民以及社区整体能力的提升,Z社区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更加充分,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协商实践,不仅内外部行动者联结更加紧密,而且各行动者所携带的资源流动也更为顺畅,能够有效调和乡村发展之张力^[26]。外部资源的价值在Z社区得到发挥,这给外部行动者以正向反馈,使其产生更为积极的合作,乡村超地方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固。

(一)需求导向的内生驱动机制

乡村产业的行动者构成是多元的,转译实践亦是动态的,往往与行动者需求重叠,各个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也会不断变动,既要把握多元主体之间长期性的共同利益,也要兼顾不断变动和调整的具体诉求。因此行动者网络整合是基于各个主体可持续的合作意愿,以及不断提升的发展能力,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内生驱动。

转译的过程即需求满足和利益协调过程,当行动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核心行动者^[27](村民)的需求,并发展村民能力作为维持产业网络运行的重要力量。譬如在“小山茶”项目启动之初,高校帮扶单位、政府、企业、村民等就对小山茶的产品包装、营销方式、利润分配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企业认为“小山茶”应主打功效宣传,而帮扶单位认为应注重品牌的文化打造,最终各方在村委会带领下进行协商,将权利归于村民,询问村民意见,最后确定以“乡村”为宣传出口,将产品赋予“天然”“纯粹”“干净”等富有乡土特色的标签。

同时,H高校基于村民需求培育社区内生发展能力,引导村民成为产业发展的行动主体。一方面是对社区居民赋能,关注居民效能感、控制感和主体性的提升。H高校以需求为导向,通过开设“骨干培育与民主协商”工作坊、“治理精英与未来社区”工作坊和“种植养殖合作社”工作坊的方式发掘能人,以此整体提高Z社区村民的产业发展意识、作物种植能力、销售能力、社区建设能力,并提供“小山茶”项目的参与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是对社区整体层面

的赋能,关注地方集体行动中主体的实践能力提升。如通过联合 Z 社区内外部力量,共同举办苗族文化展示活动、花山节歌舞晚会等集体活动,从集体行动层面推进地方居民的社区化赋能。

在两类工作坊中,我们以宣传社区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的理念为主题,运用“理念-实践”的开展思路,以引导村民参与合作社建设为实践焦点,共计开展 10 余次小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一批对 Z 社区了解深入、热情大方的能人,并在后续实践过程中对相关能人进行专业培训,使大家能够在社区带领下自主运转合作社,这对后续“小山茶”项目的持续推进很重要。(D01)

(二) 协商取向的制度保障机制

项目正式运转并不意味着行动者的退场,这一阶段更需要各个行动主体相互配合,组织化结构和制度化建设能为协商实践提供制度保障^[28],社区的协商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第一,Z 社区以内部的产业发展需求为抓手,鼓励地方精英发挥带头人作用,共同推进乡村社区经济生产类组织建设,与 H 高校共建云品寻师种植养殖合作社。由村干部号召、H 高校资金支持、村民自主参与,共同协商制定合作社章程,章程不仅对合作社的资金使用、运行规则进行规定,还明确了合作社成员需要遵守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在党组织引领下,以合作社为载体,不断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小山茶”项目发展以及 Z 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第二,以社区组织牵头成立的村民议事会,成为村民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在 H 高校的协助下^①,Z 社区根据村民意愿发展志愿服务类组织、文化娱乐类组织等。其中,Z 社区志愿服务成员不断增多,社区舞蹈队吸纳不少年轻村民,这些成员借助组织平台在产业发展方面向村委会、社区表达诉求,开展对话,趣缘组织逐渐附着协商属性。其中各组织骨干成员和其他村庄能人成为村民议事会主要负责人,村民在组织中表达意见,并由负责人在议事会中转达给村干部。第三,政府在宏观层面维系着项目的运转,在政策层面始终提供支持,是一股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则通过招商引资等正式途径入驻村庄,并在项目规划之下从事产业生产、商业经营等市场活动。

Z 社区产业发展分工体系日益复杂化,不同行动主体在基于资源而开展的产业项目中不断调整和寻找自身角色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模式。随着协商实践的展开,村民、村委会、上级政府、市场主体和帮扶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互动模式日益明确,多元主体在产业发展中逐步寻找到了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职责。

在项目启动之初,主要由 H 大学负责,包括项目设计、寻找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培养村民能力等。随着项目推进,居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不仅参与项目,还参与村里其他活动,自主性明显增强,逐渐成为项目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之后各种协商活动都不需要通过 H 大学组织,简单的事情他们(村民)自己商议,拿不准的事情向村委会表明态度,通过村民议事会或者云品合作社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A02)

(三) 资源共享的网络联结机制

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联结强调在分析、挖掘本土资源的基础上,积极链接外部资源,实现本土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这些资源在网络联结过程中被发掘和运用,并在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中不断作用和整合,建立起资源依赖关系^[29],使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行动者网络也因此被不断开发和拓宽。“小山茶”项目的资源整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 高校始终起着社区赋能的作用,项目定期在 Z 社区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活动,通过入户走访、赋能工作坊等形式,不断强化村民的内生意识和社区发展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是基于Z社区地方性资源评估,制定产业发展策略。项目团队通过对Z社区资源综合评估,在挖掘、整合本土资源优势基础上,培育特色产业。同时从公共设施建设、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共同推动乡村建设。Z社区小山茶是特色农作物,之前的发展模式是村民采摘并到集市上销售,市场渠道窄且经济价值低。在摸排社区居民需求后,H高校帮助打造小山茶品牌,不仅提升了村民经济收益,还打响了“小山茶”的品牌声誉。

二是链接整合Z社区外部资源,打破资源开发的时空壁垒。如项目团队链接社会慈善力量,从合作企业、基金会等组织获取乡村发展所需的新信息、资源和机会,“小山茶”项目共吸纳社会资金20余万元。

三是推动Z社区内外资源的深度融合,促进乡村社区资源再生。在整合Z社区内生资源的同时,高校、基金会、政府、企业等需持续注入外部资源。这些资源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借助党建联动、数字平台等形式推进内外资源融合,使乡村行动者网络不断焕发活力。小山茶的产业特色、高校项目团队的智力贡献、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政府的政策扶持、企业的市场销路等都是“小山茶”项目得以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跨地域的资源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在行动者网络中不断流动、整合,使得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行动者联结更加紧密,进一步加强了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联结,在推动Z社区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六、总结与讨论

打造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不仅推进了乡村产业发展,更是在解决流动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方面提供了具体思路。本文通过对云南寻甸Z社区“小山茶”项目的田野考察,深入探究社区居民与上级政府、市场主体、帮扶单位等行动者之间所展开的网络建构及其所附着的协商实践,不仅有利于直观了解乡村社区发展过程中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缔结,也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时期的产业发展实践。研究发现,构建产业发展中超地方行动者网络,其中关键在于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的缔造过程。这一过程包括:(1)主体层面的关系建立,即社区居民、层级政府、市场力量以及帮扶单位等多元主体在围绕乡村产业发展而展开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的合作关系。(2)网络缔结须经历“转译”,包括“问题化”“利益相关化”“征召”以及“动员”四个阶段,在明确多元行动者面临的共同问题后,需要将中心问题明确为与多元行动者相关的具体利益,以此征召多元行动者加入共同行动,并进行动员,进而建立起超地方行动者网络。(3)这一过程内含着一定的整合机制,即需求导向的内生驱动机制、协商取向的制度保障机制以及资源共享的网络联结机制,由此形成乡村产业发展内外共生的超地方网络形态。

小山茶项目不能依靠社区本身发展起来,也无法由市场单向推动,其市场化模式需要居民、政府、市场、单位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支持,使得原本分散的乡村主体在小山茶项目的带动下产生联结,并且这种联结是各主体基于自身需求而逐渐产生的,由此构成超越乡村地方性的关系网络结构。在这个超地方网络中,各主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个主体都难以取代其他主体,巩固了异质主体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因此不存在身份尊卑之别。而且,他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通过身份、功能、行动的整合体现“内外共生”的关系特质。但是跨地域的网络往往会面临流动性、异质性、复杂性等不确定性风险,异质行动者稳定、持续的合作面临挑战,亟需找到一种可行方法来整合内外行动者,以稳固超地方的关系网络,开展协商取向的网络实践。“小山茶”项目的行动者网络折射出乡村发展实践从单一的地方性逐渐走向复合的超地方场域,体现异质主体合作共生的运作模式。

随着“地方空间”被“流动空间”所取代^[30],乡村产业发展的“地方网络”也逐步向“超地

方网络”扩张,并具备三方面特征。第一,内外整合的超地方网络格局。区别于传统地方性行动者网络,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不仅由内部的居民、组织构成,还纳入了地方之外的上级政府、市场、帮扶单位,是一种内外联动的关系结构,这种主体构成的日益多元体现了乡村行动者网络从“地方”向“超地方”视角的转变,是一种整合的取向。第二,多元平等的超地方网络特质。尽管这种超地方行动者网络纳入了更多主体,且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正是这种多元主体各自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每一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村民、政府、市场、帮扶单位都具备同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行动共同体。第三,动态互动的超地方网络取向。行动者网络强调的不仅是主体位于网络中的位置,更多关注主体在网络中的互动过程^[31]。同样的,乡村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其间不断有行动者加入和退出,各行动者之间也持续进行着利益协商、行动协同的转译过程,体现了一种协商取向的发展实践。由此,整合、平等、动态共同构成了乡村产业发展中行动者网络的具体特征。

客观而言,本文采取了“行动者—转译—网络”的复合分析框架,但在乡村超地方行动者网络联结的实际过程中,一些问题仍值得思考。一是主体联结脆弱与合作壁垒。“小山茶”项目起初是由高校发起,与县域、街道、社区层面开展合作并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关系,与政府、社区协商而成,并逐步把主动权交给 Z 社区村民。若后续项目团队撤离,社区居民是否能持续发挥主动力量,基层政府、企业是否始终倾听村民的意见,多元主体之间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紧密的关系和持久的合作。二是资源分配不公与整合难题。城乡差距始终是乡村发展的症结所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流动不是绝对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资源受权力的影响未被归于应处的位置,乡村如何获取需要的资源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三是社区参与不足与协商困境。尽管乡村产业发展较前些年得到提升,但社区参与不足的情况仍然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如何将乡村边缘群体纳入乡村发展的整体力量,如何发展更有效的协商机制,是社区建设以及激发社区动力需要长期关注的方面。

总体而言,现代流动性社会甚至是脱域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乡村内部产业发展向内外共生的产业合作发展转变,这意味着农民群体不仅需要具备个体化的发展能力,还需要能够与其他居民以及外来行动者甚至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展开超地方合作的能力,这一过程则有赖于通过建构超地方行动者网络达成。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方法指引对“小山茶”项目进行田野考察,在理论层面不仅有利于丰富行动者网络理论内涵,推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本土化应用,而且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建立提供新的参考路径,丰富中国关于乡村发展理论的研究和产业发展模式。在实践层面,本文对乡村跨地域多元主体的网络联结展开分析,有利于发掘乡村优势和整合乡村资源、推动内外整合,促进乡村多方面共同发展。总的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乡村产业发展实践提供新的选择,建立超地方行动者网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特别予以感谢。

参考文献：

[1] Skocpol T, Ganz M, Munson Z. A Nation of Organizer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ivic Volunta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3): 527-546.

[2] 曾薇. 在地化调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6): 103-123.

[3] 许汉泽.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联村发展”——对陕南 H 县“三联”经验的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1(1): 106-120.

- [4] 贺林波, 李甜.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 B 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6): 99-115.
- [5] 李培林. 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 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6): 1-17.
- [6] 王春光. 乡村建设与多元共享利益共同体的建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15): 48-54.
- [7] Bosworth G, Annibal I, Carroll T, et al. 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J]. Sociologia Ruralis, 2016, 56(3): 427-449.
- [8] Wenger E, McDermott R, Snyder W.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Guide to Managing Knowledge[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2.
- [9] Adamski T, Gorlach K.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Revalidation of Local Knowledge[J].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4(160): 481-497.
- [10]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32(1): 196-233.
- [11] 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M]. 刘鹏, 安涅思,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106-120.
- [1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7.
- [13]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8.
- [14] 赵万里. 科学的社会建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287.
- [15] Borch C. Machine Learning and Postcolonial Critique: Homologous Challenges to Sociological Notions of Human Agency[J]. Sociology, 2023, 57(6): 1450-1466.
- [16] 文军, 陈雪婧.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 模式、困境及其超越——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 社会科学, 2023(1): 141-152.
- [17] Collon M. 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J].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1980(4): 197-201.
- [18] 李卓, 郑永君.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 A 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1): 162-168.
- [19] 王越, 刘余.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2): 51-61.
- [20] 田毅鹏, 钟祥纬. 乡村振兴背景下“带动小农户”议题的社会政策意蕴[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4): 221-233.
- [21] 张树沁, 邱泽奇. 乡村电商何以成功? ——技术红利兑现机制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22, 37(2): 114-136.
- [22] 刘津.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5): 59-70.
- [23] 李路路. 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J]. 社会学研究, 2012, 27(2): 1-19.
- [24] 卢宪英. 紧密利益共同体自治: 基层社区治理的另一种思路——来自 H 省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效果的启示[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6): 62-72.
- [25] Callon M. Four Models for the Dynamics of Science[M]//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2455 Teller Road,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9132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28-63.
- [26] 文军, 陈雪婧. 国家介入与地方行动: 乡村内生发展的张力及其化解[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1-13.
- [27] Latour B. Postmodern? No, Simply Amodern! Step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M]. Londo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 145-171.
- [28] 蔡禾, 黄晓星. 城市社区二重性及其治理[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4): 89-100.

[29] 马迎贤. 组织间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J]. 社会, 2004(7): 33-38.

[30] Castells M.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Cambridge,MA: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1-594.

[31] Harman G.The Importance of Bruno Latour for Philosophy[J].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007(1):31-49.

(责任编辑: 宋雪飞)

Toward Super-local A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tor-network in Rural Industries and Its Negoti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Field Study of the “Xiao Shan Tea” Project in Z Community, Xundian, Yunnan Province

CHEN Xuejing FANG Shumin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unity mobility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t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industry is evolving from the local to the hyper-local. This paper, based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Xiaoshan Tea” project in the Z Community of Xundian, Yunnan Province, employs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actor-translation-network”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first examines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of rural industry’s hyper-local actors, including local residents, higher-level government, market players, external universities, and other key stakeholders. Secondly, it delves into the process of multi-subject translation negotiation, identifying four stages in the networking of hyper-local actors: focusing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sues,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ing diverse interests, enlisting and connecting development agents, and mobilizing and engaging in negotiation action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of the actor network in rural industry, including a demand-oriented endogenous drive mechanism, a consultativ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a resource-sharing network connection mechanism. These elements collectively form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network, culminating in the creation of a rural industry’s hyper-local actor network that foste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mbiosis.

Keywords: Rural Industry; Actor Network; Negotiation Practice; Hyper-local Action